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现实堵点、理论机理与政策建议：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杨水根 马悠弼 李倩莹^{**}

【摘要】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客观要求。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循环畅通面临的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和供需协调适配不足等现实堵点的基础上,结合城乡关系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构建了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依托分工发展理论,深入剖析分工发展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机理。本文提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需要满足三个维度目标:微观上,引导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要素统一大市场;中观上,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城乡产业加速融合;宏观上,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并行,形成良性供需适配体系。

【关键词】城乡经济循环;政治经济学;分工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引言

城乡经济循环是社会生产大循环的重要内容。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 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流通数字化赋能城乡经济循环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3BJY193)的资助。

^{**} 杨水根(通信作者),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E-mail:jxtx8689@163.com;马悠弼,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倩莹,湖南工商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引文格式: 杨水根,马悠弼,李倩莹. 2025.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现实堵点、理论机理与政策建议: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政治经济季刊,4(3):50-74.

Cite this article: YANG S G, MA Y B, LI Q Y. 2025. The real obstacles,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smoothing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3): 50-74. (in Chinese)

“构建新发展格局,潜力后劲在‘三农’,迫切需要扩大农村需求,畅通城乡经济循环”。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充分发挥乡村作为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增强城乡经济联系,畅通城乡经济循环”。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必须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打通市场准入退出、要素配置等方面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可见,城乡关系受党和国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举,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

近年来,随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稳步推进,有关城乡经济循环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其中,围绕城乡经济循环现实梗阻、作用机理及实现路径等的研究不断丰富。要素流动存在制度性障碍是农村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傅颖,2021),城乡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间衔接不畅是造成城乡发展失衡的重要制约因素(吴振方和李萍,2021),县域经济承载能力和链接功能不强会阻碍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涂圣伟,2021),城乡供需错配和人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供给质量不高之间的矛盾影响城乡间形成更高水平的供需体系(陈健,2022),而区域发展不平衡则会加剧城乡经济循环发展差距(贺培科,2024)。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在于产品循环、要素循环和供需循环(张世贵等,2023;李俊高,2023),应聚集生产要素、加强要素和制度供给(袁树卓等,2019),促使城乡间各类服务与要素实现自由高效循环流动(范斐,2024),推动农村产业融合、促进产业兴旺(曾福生和蔡保忠,2018),延伸产业链、避免产业单一化(朱启臻,2018),强化县域联动、构建以县域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陈健,2022),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强化需求侧管理(涂圣伟,2021),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平衡发展。

站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协调城乡关系已成为我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正逐步推进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当面临的实际问题越复杂、越艰巨,越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求指导(冯永泰,2023)。基于此,本文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结合分工发展理论以如何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为基本出发点,重点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探讨: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面临哪些现实堵点?如何构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分工发展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机理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围绕上述问题集中研究和分析,既是对新时代重塑城乡关系认识的深化,也力求为促进城乡经济循环、优化政策设计提供基本参考。

二、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现实堵点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不平衡关系得到很大缓解,在多个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从居民收入增长看,根据国家统计局 1978—2024 年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得到大幅提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 343 元和 134 元增加至 54188 元和 23119 元,城乡收入差距从 2.56 倍降为 2.34 倍。从居民消费支出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1 年至 2024 年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稳步提高,2024 年年末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 34557 元和 19280 元,相较于 2001 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而言,其消费增长率分别高达 545.93% 和 969.33%。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总人均消费支出中所占比例从 39.7% 上涨至 2024 年的 46.1%,提高了 6.4 个百分点,人们对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开始有了更高的追求。从基础设施建设看,我国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设施能力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底,我国已累计建成 425.1 万个 5G 基站和 207 个千兆城市,实现了县县通千兆、乡乡通 5G,且 90% 以上行政村实现 5G 网络覆盖,5G 加速向农村延伸,覆盖广度、宽度、深度持续拓展,有效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见,城乡发展在多个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城乡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发展的新要求,城乡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发展鸿沟,畅通城乡经济循环还在微观、中观、宏观等维度面临着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产业融合程度不高、供给与需求未实现协调平衡等诸多现实堵点。

(一)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不畅

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王喆,2024)。当前我国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仍存在一些堵点,“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有序性和平衡性问题突出,其本质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制度性壁垒未完全破除等问题的集中体现。

一是劳动力流动的“半城镇化”与人才下沉梗阻并存。尽管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庞大,但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挂钩的机制导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大量农民工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仍面临差别化待遇,形成“就业在城市、保障留农村”的“半城镇化”现象。与此同时,城市人才向乡村流动面临着农村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职业发展通道狭窄等多重壁垒,使得技术管理人才下沉意愿不高。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3

月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数累计 1120 多万,其中 70%是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创办项目中 80%以上是乡村三产融合项目,城乡人才循环仍呈现“单通道”特征。

二是土地要素权能不对等与市场化配置不足。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不健全、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机制和增值收益分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容易导致要素流通受阻(曾恒源和高强,2025)。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仍存在产权界定模糊、交易平台缺失等问题,同时,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困难且缺乏有效的市场化退出机制(杨水根等,2025)导致农民退出宅基地积极性不高。农业农村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农村宅基地闲置率为 18.1%,但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最新数据显示,2024 年,在闲置的宅基地中,受访农户表示愿意有偿退出的仅为 25.53%,土地市场化配置尚显不足。

三是资本流动的城乡失衡与双向循环断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 91414 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 6.8%。值得注意的是,其流入的投资只有 9543 亿元,仅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的 1.9%,且多集中于基础设施领域,对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有限,资本要素呈现一定的“虹吸效应”。同时,城市资本下乡面临产权保护不足、回报周期长等风险,而农村储蓄向城市单向流动则加剧金融资源错配,农村存款外流现象普遍,导致乡村产业发展缺乏金融支持。此外,工商资本联农带农机制尚未健全,使得资本与农户间未能形成稳定的协同关系,进一步阻碍了城乡间双向循环的顺畅实现。

(二) 城乡产业融合程度不高

城乡产业融合是指促进城乡间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自由流动,加强城乡间优势互补,实现不同产业相互渗透、交融与一体化发展的动态发展过程^①。城乡产业有机融合有助于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近年来,我国在城乡产业融合方面做出一系列探索,取得一些成效,但要素配置失衡、产业链延伸不足、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然存在,导致城乡产业融合程度不高。

一是要素配置失衡与流动性阻滞。结合上述城乡产业融合的概念可知,城乡要素市场的流动不畅是制约产业融合的深层次问题。城乡间“人、地、钱”等要素配置失衡,具体表现为:部分偏远乡村地区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集聚,导致该地人力资本逐步面临“空心化”困境;传统城乡二元产权制度导致市场化配置难度大,土地要素价值难以释放;资本则由于城市高收益导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2021-12-23)[2025-03-22]. 县域内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实践探索. http://www.zcggs.moa.gov.cn/zcygggw/202112/t20211223_6385387.htm.

虹吸,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不足。这种要素流动的“剪刀差”不仅加剧了城乡产业发展的资源错配,更阻碍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使得产业融合缺乏要素支撑,进而阻碍城乡产业深度融合。

二是产业结构失衡与产业链延伸不足。目前,我国农业与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智慧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以及农村电商、精品民宿、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发展还较为缓慢,且面临资金、技术等壁垒,导致产业结构布局尚不协调。同时,乡村产业仍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主,加工环节薄弱,产销协同性差,导致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户在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增殖收益占比不足。据《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 2024》,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达到 2.52 : 1,但远低于发达国家 3.5 : 1 的水平,农民难以分享产业链延伸的红利。可见,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在未来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三是技术基础设施支撑不足与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一方面,农村数字化水平与城市相比还较低,农业生产智能化、信息化应用有限,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程度不高;同时,部分偏远农村地区道路、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城乡产业协同效率。另一方面,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间缺乏紧密的利益联结共享机制,使得多数农民仍处于产业链底端,难以通过入股、分红等方式参与增殖分配,导致城乡产业融合的内生动力不足。

(三) 城乡供需协调适配不足

城乡供需协调适配是形成城乡共生关系的重要方面,不仅有助于实现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还能加速推进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当前,我国供需两端仍存在互动失衡问题,具体表现为农村消费需求释放乏力、城乡供给体系结构性断层、供需互动渠道效能不足等,既制约了农村内需市场的扩容升级,也阻碍了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一是农村消费需求释放乏力。随着受教育水平提升、消费观念更新以及消费便利化程度提高等,农村居民总体展现了较强的消费意愿,但相较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在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等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王蕴,2023),农村消费市场升级潜力和需求空间巨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 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 55.7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 2.34 : 1,叠加社会保障覆盖不足,导致农村消费增长潜力亟待充分释放。同时,农村市场消费品供给呈现“低端过剩”与“品质短缺”并存,使得约占全国人口 33.00% 的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仅贡献了 13.68%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村消费需求增长具有较大空间。

二是城乡供给体系结构性断层。一方面,从工业品下乡角度看,流通成本

较高,部分产品功能设计偏离农村实际需求,导致农村潜在需求难以满足,城乡供需难以很好地适配。另一方面,从农产品上行角度看,据《中国农产品产地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4)》,2023年我国农产品产地综合低温处理率为32.0%,冷链物流覆盖率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还较低,优质农产品难以有效对接城市消费升级需求,这种城乡供给体系的结构性断层造成城乡供需价值链条的“双重损耗”,即城市过剩产能无法消化,农村潜在需求未能得到较好满足。

三是城乡供需互动渠道效能不足。城乡供需衔接的物理通道与信息通道尚存在堵点卡点。物流流通层面,县域商业体系作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其功能有待加强。同时,农村电商配送“最后一公里”成本较高,且部分行政村缺乏冷链仓储设施,导致生鲜农产品电商损耗严重。信息传导层面,供需大数据平台建设滞后,农村经营主体对城市消费趋势的捕捉能力尚显不足,加剧供需错配。值得关注的是,传统流通体系与新兴渠道的协同效能未得到充分释放,城乡间商品流通和信息传导更加困难,进一步加剧城乡供需衔接的梗阻。

三、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理论框架构建

在把握城乡经济循环面临的一系列现实堵点的基础上,如何从理论层面系统性地回应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为此,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视角,通过厘清城乡关系的历史性演变,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构建起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 城乡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古至今,城乡关系经历了不断的历史性演变,随之也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以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城乡关系的演变,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揭示了城乡关系演变的动力与规律。城乡关系从缘起、到分离和对立、再走向融合是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的科学诠释和必然逻辑,为中国在新时代下重塑城乡关系、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周清香和何爱平,2022)。

1. 城乡关系缘起

在人类社会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基本处于游离状态。随着生产工具的出现、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人类开始建造居所,乡村部落得以出现;劳动工具的丰富与改进,使得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开始出现“小农经济”,基于此形成的乡村部落,奠定了城市的雏形。同时,由于城市拥有更多的人口和先进的生产力,更多剩余农产品和要素等资源将集中于城市。因此,当

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就会随之产生。

“商业起源说”强调,城市的形成源于商业或商品交换。该观点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日益密集的固定居住点产生,构成了城市的雏形。回溯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在《周易·系辞下》中有相关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有些城市起初并没有城墙、定居人口及固定作坊和店铺,可能是小村庄或甚至没有村庄,日中而集市、日落而散,形成集市,逐渐有了固定居民和店铺,前店后坊也随之出现,形成一定规模的城市。城市聚集所带来的规模效益能促进效率提升,这与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在生产力理论中,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进步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基于社会分工视角阐释城乡的出现和分离,认为民族内部的分工导致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进而引发城乡分离及利益对立(芒福德,[1968]2018)。按照马克思学说的逻辑,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导致剩余农产品的出现,并促使少量商品交换和人类定居点的形成。人们将农副产品交换集中于交通方便、人流量相对集中的地方,交易市场随之形成,这种市井交易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商业、手工业为主的村庄。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小村庄构成城镇形成的基础,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城市。据此,可以说,生产能力的提升丰富了物质产品,物质产品的增加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2. 城乡关系分离和对立

一般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会导致城乡间出现分离与对立的关系。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主张,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没有城市和乡村之分,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乡之分也就随之产生。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时,城乡之间必然也会产生联系(李怀,2015)。社会中蕴含的多种因素又会使城乡关系复杂化(郭殿生和宋雨楠,2019),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使得城乡关系逐渐走向分离和对立。

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深化,进一步推动了城乡关系的演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 pp. 147-148),即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导致城乡关系的分离,分离关系又进一步促使城乡之间矛盾加剧以至走向对立。具体表现为大量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和社会财富流向城市,使得城市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农村由于生产力发展落后,与城市形成鲜明对比。城乡差距日益扩大,城乡关系走向分离与对立。

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进步促进一种新生产关系的产

生,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因为它的出现激化了城乡间分离与对立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城市与乡村相当于两个阶级,大量资本和劳动力掌握在城市手中。在利益的驱使下,城市不断剥削劳动力获得大量剩余价值,进一步促使更多的生产要素向城市集中,乡村的优势要素与劳动力也成了其掠夺对象,促使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也不断扩大,加剧了城乡分离与对立(张桂文和王子凤,2022)。因此,城乡关系走向分离对立可看作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所导致的,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则使得城乡矛盾尖锐化(董济杰,2017)。

3.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演变的高级目标。只有城乡关系从分离对立走向融合,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1964,p. 31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导致城乡关系的分离和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p. 308)。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并达到一定高度,城乡之间的关系将最终走向融合。

从生产力角度来看,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高度,社会分工也随之深化,社会全体成员都得到全面发展,城乡矛盾得到缓解,两者逐渐走向融合。随着城市中的现代化生产方式不断向农村扩展,农业生产力会得到提高,农业农村逐步实现现代化,与城市差距缩小(许彩玲和李建建,2019)。应利用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即人类社会分工日趋合理,推动城乡功能互补互促,创造出满足全体社会成员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为实现城乡融合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城市和工业发展比农村和农业发展拥有先天的优势,只有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共同发展,才能提高全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发展。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城乡分离对立的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pp. 308-309)。显然,消除城乡对立、实现城乡融合被马克思恩格斯视作废除私有制的制度前提。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资本主义私有制终结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亡,旧式分工模式也将消失,未来社会不再是城乡之间的僵化对立,而是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周清香和何爱平,2022)。

(二)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框架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思想科学地揭示了城乡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

力和发展规律,准确预判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并指出了推进城乡融合的实现方式(冯永泰,2023)。目前学术界关于城乡经济循环的内涵还未形成统一界定。相关学者认为城乡经济循环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合理统一的城乡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均等化(冯淑怡等,2021);也有观点认为城乡经济循环是依托分工体系 and 市场体系,并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城乡两个异质性空间要素对流、产业协调发展的过程(涂圣伟,2021);还有学者则以新发展格局为背景,进一步指出城乡经济循环凸显了城乡要素流动的双向性、城乡市场和产业的统一融合性、促进共同富裕的导向性、科技自立自强的支撑性以及有为政府推进城乡经济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性等特点(陈健,2022)。本文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维度,即要素流动、产业融合、供需适配来界定和理解城乡经济循环,并通过构建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框架(见图1),力求在更大视野下实现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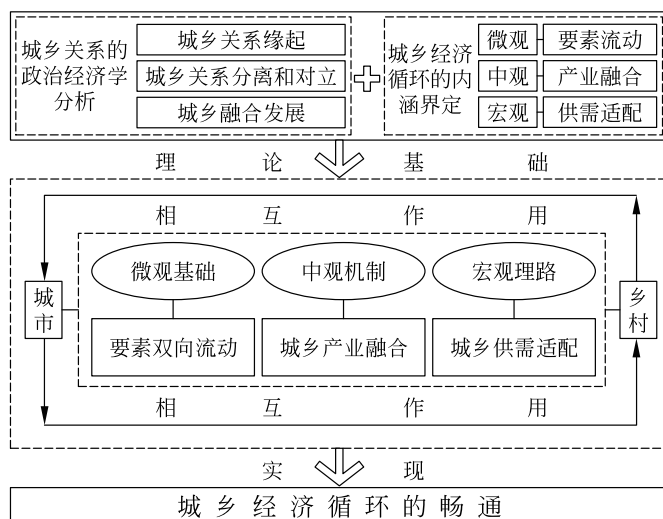


图1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分析框架

1. 要素双向流动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微观基础

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消除我国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协调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作机制,更多关注的是工业城市发展和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在人口要素方面,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城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促进城市发展,加快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同时,通过城市的教育、技术培训等资源提升进城人口的自身素质,在政府政策引导下,农村户口人才返乡、大批高素质人才流入等进一步成为现实,助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在资金要素方面,城市作为资金集聚地,吸引大量资金投

人和先进技术支持,能够向农村输送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等资源,促进农村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并且这些资金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回流农村,用于农业生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有效缓解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强化农村发展资金保障。在数据共享与交流方面,实现城乡间信息互通,城市通过了解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情况,有针对性地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开展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业务,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同样,农村通过数据分析城市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调整农产品生产结构,提高农产品竞争力,推动农业产业创新发展。基于此,要素的双向流动、平等交换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解决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问题,为农村农业发展持续注入新活力,进一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打通经济循环堵点,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

2. 城乡产业融合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中观机制

产业互融是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实现城市生产与乡村生产有机统一,那时候“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p.123),真正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范根平和王玲玲,2023)。随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作植物的肥料”(马克思和恩格斯,2009,p.313)。同时,在我国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要“着力推动新兴产业和乡村产业的融合和集约化发展”。可见,在城乡经济循环中,城市对周边区域和乡村具有辐射作用,有效发挥城市的积极作用,推动城乡产业深度融合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所在。推动城乡产业互动融合,一方面,能将先进产业与农村传统产业结合,形成新的产业模式,促进产业聚集和创新,既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农村产业的附加值,又能提高产业竞争力水平;另一方面,不仅有助于推动农产品和农村资源向城市流动,而且还能将城市技术、资本和人才等优势引入农村,构建更加完整的产业链,提高产业资源利用率,提升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实现城乡经济良性的循环发展。

3. 城乡供需适配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宏观理路

实现供需适配既是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

是不能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60,p.57),只有使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进而影响未来社会人的全面发展(何兵兵,2023),才能推动城乡供需适配,实现城乡的全面融合。一方面,城市凭借其完善的物流网络、广阔的消费市场和先进的营销理念等优势,能为农产品的销售开辟多元化的渠道,促使更多绿色、高质量的农产品在城市市场流通,为城市居民提供更为丰富优质的农产品,不断满足居民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的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形成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城乡融合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和产业链延展的不断深化,计算机、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向农业渗透,在提高农业发展现代化、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的同时,也提高了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无缝对接。此外,农村可根据当地特色资源和互联网科学技术,发展当地特色农业及绿色食品加工业,生产出更多与城市适配的绿色农产品,实现农产品供给的提质增效。可以说,城乡供需适配是宏观层面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加强城乡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供需双方的精准对接和协同发展,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总的来看,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需要三个基本条件,即实现要素双向流动、产业互动融合以及供需协调适配,它们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增强城乡统筹发展力度、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步伐的内在要求,有助于在更高水平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目标。

四、分工发展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理论机理

分工发展作为经济规模扩大的重要基础,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构建国内大循环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更是实现共同富裕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亚当·斯密([1776]2014)在《国富论》中指出分工是劳动生产力得到大幅提升的动力,而市场大小会限制分工。李嘉图提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的国际分工理论(张衔和范静媛,2022)。阿伦·杨格重新发掘并进一步发展总结了“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然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向国成等,2021)。杨小凯运用超边际分析模型化有关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指出分工如何促进市场的产生,又如何在迂回生产过程中得到深化发展(杨永华,2008)。马克思指出自然分工作为分工的最初形式产生于人类早期社会的自然经济条件中,社会分工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逐渐形成(蒋永穆和周宇晗,2018)。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市场经济发展的底层逻辑,即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及其持续运行条件的思想,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分析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的逻辑理路：城乡分工孕育了行会制度下的手工业，商业与生产分工孕育了商人阶级，促进了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各民族交往扩大、人口增长与集中，促使工场手工业日益繁荣，世界市场、国内自由竞争与科技发展催生了实行最广泛分工的大工业（向国成等，2021）。遵循上述分工理论逻辑，下文将结合城乡经济循环是微观要素双向流动、中观城乡产业融合、宏观城乡供需适配的概念界定，探寻适于协调中国城乡关系的思想。

（一）分工发展促进要素双向流动

要素是生产过程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狭义要素方面，有关生产要素组成的理论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经济学家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一观点在古代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则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指出：生产要素由劳动力、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组成。在广义要素方面，现代生产要素的组成已经进一步发展。除了传统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外，技术、数据乃至任何可以产生价值的诸如生态等新型要素都可以纳入这个广义的概念中（宁志中和张琦，2020）。分工作为提高效率、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及发挥各自相对比较优势的重要手段，能够打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堵点，有效实现城乡之间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数据等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

1. 土地流动

打通土地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通道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一环。依托分工发展推动土地要素的优化配置与市场化改革，充分激活土地价值。一方面，“城市产业用地—县域工业用地—乡村生态用地”差异化供给体系的建立，通过空间功能分工来优化土地配置。例如重庆“地票交易”的创设，使得农村闲置宅基地复垦产生的指标可置换为城市用地指标，土地跨区域配置成为现实，带动乡村发展。另一方面，产业细分促进土地要素市场化，使得不同产业对土地的需求更加明确和差异化，并形成多元化的土地需求市场，进而加速土地要素的流动和交易，实现土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的提高。

2. 劳动力流动

劳动力流动是城乡分工的必然结果。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之间差距逐渐拉大，产业梯度分工引导着人才流动，越来越多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进城务工。而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恰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支撑以有效缓解城市劳动力短缺和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家积极推出相关政策，如鼓励农民工返乡、有序引

导大学生毕业到乡、能人回乡、企业家人乡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新发展,在政策的支持及农村巨大发展潜力的吸引下,有效实现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可以说,在分工合作的分配机制下,融合了要素发展的新思路,畅通了城乡间劳动力双向流动的通道,缓解了农村地区优质劳动力缺失导致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

3. 资本流动

资本的流通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的交易过程。在我国城乡分工格局下,资本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且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指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保障资金在农村地区的投入”。一方面,由于城市相较于农村拥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市场和人力资源,其经济发达,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以大量的原材料和农产品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础,通过分工合作,资金下沉到农村地区,支持农村地区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特色资源开发等。城市和农村应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动资金双向流动。

4. 数据流动

数据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优质生产要素,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持续注入新动能。应基于分工合作,再结合当今城乡间数字技术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实现各环节的数字化信息共享和传递。尽管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各有差异,拥有不同需求,但数字化数据的流动能够将不同市场的需求信息传递给对方,帮助农民了解需求市场的同时,也能将农村的生产和资源以数字化数据的方式反馈给城市,使得城市通过数据了解农村的生产能力、资源供给等情况,制定合理合作计划,促进双方的信息资源交流,弥合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间要素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分工合作,推动城乡协同发展。

(二) 分工发展推动产业深度融合

从本质上看,产业组织革新推动产业融合,而分工是产业组织变化的基础(马德隆和许正中,2023)。产业融合是指“由于技术进步和放松管制,发生在产业边界和交叉处的技术融合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特征和市场需求,产业的企业间竞争合作关系发生改变、模糊化甚至重划了产业界限”(马健,2002)。应通过要素双向流动、资源共享与互补和产业链横纵向发展等方式实现产业之间的协同与互补,进而实现产业链的优化与升级。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普及,加快了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苏毅清等,2016)。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化赋能分工发展,为产业融合带来新契机,促进产业融合进一步发展。

1. 要素双向流动奠定产业融合的基础

产业融合的实质就是产业间分工的内部化。分工是推动城乡经济协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手段。一是坚持“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鼓励资本要素下乡,积极引导城市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通过技术、资金和人才的溢出效应,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供给,实现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二是不同产业技术交叉融合、彼此借鉴,加快农业向现代化迈进的步伐,有助于农产品提质增效,提升农业科技发展和企业竞争力水平,增强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县域、城市地区转移,有助于形成以县域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围绕县域和城市的禀赋优势,统筹城乡发展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带动形成衍生产业和配套产业(吴振方和李萍,2021)。在分工协作的过程中,将生产过程分解为多个环节,并不断专业化和标准化,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提高经营效益,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

2. 资源共享与互补提升产业融合速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空间体系由于区域发展动能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其在资源动态配置中不断重构。基于此,区域发展的协调已不能仅仅通过对特定地区的政策扶持来实现,还需要追求区域资源的合理共享与动态平衡,推动区域关系在发展中向“相互依存、优势互补、共同成长”转变(戴一鑫和李杏,2023)。一方面,农业产业内部融合,即农业产业内部各子产业之间相互融合,上下游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助推农业产业内部各子产业间的融合发展(赵霞等,2017)。另一方面,城市拥有较高的科技发展水平和较发达的经济体系,而农村在资源分配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城乡区域各政府部门之间可以通过信息和资源共享,实现优势互补,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共享监测数据和规划信息,企业之间开展合作研发、共享信息技术、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提高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同时,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进而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产业链横纵向发展推动产业融合水平提升

分工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的逻辑起点为:随着农村产业组织内部的分工逐渐深化,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各农业经营主体打破原有产业组织间界限,细化产业内分工(向国成等,2017)。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大提升,但依然存在农村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以及“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这势必要求与之适应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是农村产业分工由单一的农业逐渐过渡到一二三产业并存、相互作用的分工体系,不同产业间形成产业链,实现上下游企业间的合作与协助,经济发展实力不

断增强;二是随着城乡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产业链向横纵方向发展,如京东、拼多多等大企业资本下乡,有效加强了城乡间的产业融合;三是应用互联网、生物等高新技术的程度不断加深,出现农业与其他产业渗透、交叉和重组的趋势,产业分工不断扩大深化(冯永泰,2023),产业链不断优化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

4. 数字化赋能拓展产业融合新领域

新时代,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作为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通过全面促进要素重组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互动融合发展(王海霞等,2023)。首先,数字化技术通过信息化系统打破时空限制、跨越信息鸿沟,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和互通,不同产业的企业能够快速获取和传递信息,提高决策效率和协同能力,进一步促进产业融合,助推城乡经济循环;其次,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能够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不仅能为乡村土地、集体资产等要素产权提供有效依据,促进乡村各类闲置用地的重新开发与利用(王海霞等,2023),而且还能精准了解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配置,提升产业融合的效益;再次,数字化发展为产业融合带来创新机会,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市场的传统时空界限被打破,各类市场主体加速融合,不同产业的企业可实现跨界合作和创新,并通过更加专业化的分工,共同研发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促进企业的创新和竞争能力的提升,推动产业融合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三) 分工发展加强供需协调适配

分工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斯密([1776]2014)在《国富论》中就强调了分工能通过专业化提升劳动者的技能,减少工作转换带来的时间损失,以及促进机器的发明和应用,从而极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各个生产环节逐渐分离,形成了专业化的生产部门,从而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使得市场上的供给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日益多元化。消费者对于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的功能,而是更加注重品质、个性化、体验等方面。分工发展所带来的供给结构的多样化和精细化,正好与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相匹配,并通过影响市场信息的传递和处理,进一步加强供需协调适配。

1. 分工发展提高生产效率,夯实供需适配基础

首先,从劳动者角度出发,分工使得劳动者专注于特定任务,得以在不断重复操作中积累专业知识与技能,使得劳动者对特定工作的熟练程度提升,完成

单位任务所需时间逐渐减少,进而降低失误率、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是说,在相同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更多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从而增加市场供给量,满足消费者对产品数量的需求。其次,分工促进了专业化生产,使得企业对不同生产环节的技术需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从而更精准地投入研发资源,推动技术创新,形成当期的新质生产力,并将其应用到生产过程中,能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再次,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企业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在大规模生产下,企业在原材料采购、设备使用等方面具有更强的议价能力,降低单位生产成本,促使企业能够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产品,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扩大市场需求。同时,规模经济下企业可以利用节省的成本进一步投入研发与生产优化,持续提升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形成供给与需求之间相互促进、协调适配的良性循环。

2. 分工发展优化供给结构,契合多元消费需求

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过程逐渐细分,企业得以专注于特定环节,实现生产的高度专业化。专业化生产的直接结果是产品差异化程度显著提高。在分工体系下,企业可针对不同消费群体的偏好、功能需求及审美观念,开发出丰富多样的产品。以电子产品领域为例,有的企业专注于高性能处理器研发,为追求极致运算速度的消费者打造高端产品;有的则聚焦于轻薄便携设计,满足经常移动办公人群的需求。这种差异化供给精准对接了不同消费群体的特殊需求,极大地丰富了市场产品种类。另一方面,从市场细分角度来看,分工发展使企业能够更精准地识别不同消费群体的特征与需求。通过对市场的深入分析,企业将具有相似需求的消费者划分为不同细分市场,并为每个细分市场量身定制产品。这一过程不仅提升了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响应能力,还能有效避免产品同质化竞争。各细分市场都能得到更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供给,消费者的多元需求也能得到充分满足,市场供需在结构上实现了更精细的匹配。可以说,分工发展通过推动生产专业化、促进产品差异化以及实现精准市场细分,优化了供给结构,紧密契合了消费者日益多元的消费需求,有力地加强了供需协调适配,推动经济高效、均衡发展。

3. 分工发展促进信息流通,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首先,在分工体系下,经济活动被细化为多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各环节的企业间形成了紧密的协作关系,这为信息的快速传递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各企业专注于特定领域,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大幅提升,能够更精准地捕捉与自身业务相关的信息,如原材料价格波动、技术创新趋势以及消费者需求变化。其次,企业间频繁的业务往来促使信息传递渠道更加顺畅。例如,在产业链中,上游供应商能够及时将原材料的供应情况、价格变动信息传递给中游制造商,

制造商根据这些信息调整生产计划,并将产品生产进度、质量反馈等信息传递给下游销售商。销售商则凭借与消费者的直接接触,收集消费者对产品的评价、需求等信息,并反馈给上游企业。这种信息的双向流动,使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都能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再次,分工发展能提升企业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专业化分工使得企业具备深入分析特定领域信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更高效、准确地解读与分析。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深度挖掘,企业可以预测市场需求的变化趋势,提前调整生产、库存与销售策略。这种基于信息流通与处理的快速响应机制,使供给能够紧密跟随需求的动态变化,及时填补市场空缺,避免产品积压或短缺,从而实现供需的动态平衡,有效加强了供需协调适配,保障城乡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五、畅通我国城乡经济循环的政策建议

我国城乡关系历经了多个阶段的演变: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的城乡分离,到改革开放后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初步探索与曲折实践,再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新型城乡经济循环体系开始逐步构建,城乡关系正从低水平的城乡融合发展转向高水平“互利共赢”“共生共存”的城乡经济循环模式。基于前述分析,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实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 引导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要素统一大市场

在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过程中,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基本要素是城乡经济畅通循环的着力点。当前要素流动存在诸多障碍,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城乡间要素平等自由对流,破除人、财、地等关键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当务之急的内在要求。其中,在人口要素方面,应建立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促进城乡人力资源双向流动,引进新型农村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同时保障农村人口的基本权益,进一步解决农村人口在城市落户问题;应培育农村新经济,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农村经济新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鼓励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优化农村人口结构。在土地要素方面,宅基地作为农村土地制度安排中最特殊、影响最敏感的一块地,与人口迁移、资本流动、产业转移等其他要素流动紧密关联,是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应做好农村土地空间规划,合理确定“重点镇—一般镇—中心村—一般村”的镇村规划体系,有效衔接其他规划或政策(冯淑怡等,2021);应完善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放开农村集体产权,盘活农村土地流转,扭转土地

流转困境,合理解决农村房屋产权问题,保障经营主体权益,为农村居民提供资本支持。在资金要素方面,政府应积极引导,制定相关政策和法律,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补贴和奖励措施,吸引企业和个人将资金投入农村地区,鼓励资金在城乡间顺畅流动;深化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构建多层次普惠金融体系;应强化工商资本下乡制度保障,构建利益共享长效机制,实现资本要素优化配置,推动形成“城市反哺农村—农村回馈城市”的良性循环机制,同时需注意防控金融风险,建立健全资本流动动态监测系统,确保改革在安全边界内推进。

(二) 充分发挥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城乡产业加速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的带动和支持,要以自身特色产业为抓手、发挥地区间的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多元产业融合,协调城乡平衡发展。一方面,就发挥地区优势而言,合理规划和配置城乡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加大城市先进数字化科技对农业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借助更高技术含量的农业劳动资料、更高素质的农村劳动者以及更广范围的农村劳动对象,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推动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立足农村当地特色资源,建立健全农业产业链,增强县域地区的核心带动作用,提高产业链中农村地区居民收入,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建立城乡合作机制,鼓励和支持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资源互动共享。另一方面,就因地制宜而言,根据地区所拥有要素禀赋制定发展策略,合理利用当地资源,以县域特色产业为基础,开展农业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现代化农产品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实现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地区经济的竞争力;结合当地农业资源和市场需求,通过技术培训、科技创新,提升农业发展现代化水平,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特点,出台相关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加强环境治理的同时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打造地区发展融资渠道,发展地方金融机构,为农村地区发展筹集更多资金,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通过发挥地区优势、因地制宜,不仅能够促进产业融合交流平台的搭建、激发各产业间的交流合作,而且能够推动不同产业间的技术知识转移,实现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机结合,更好助力产业融合发展。

(三) 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并行,形成良性供需适配体系

市场是不完全的,政府也是不完全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

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让需求更好地引领优化供给,让供给更好地服务扩大需求。统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各自功能、力克对方之不足,推动城乡供需适配,着力推进城乡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之间形成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良性互动和高水平动态平衡,“有效市场”“有为政府”需协同并行。首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机制,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其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制度。当出现市场失灵、作用不足时,政府及时弥补市场短板,根据当前城市与乡村各自的发展特点,制定并执行相关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避免出现“重城轻乡”或“重乡轻城”现象;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公共服务、推动科技创新等手段,重塑城乡价值链条,提高城乡供需的匹配度。再次,利用政府监管和政策引导,保证市场正常有效运行,防止市场失灵;反之通过市场有效运行为政府提供参考依据,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措施,促使“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推动城乡平衡发展、适配城乡供给与需求,促进城乡经济循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

参考文献

- 陈健. 2022. 新发展格局下城乡经济循环畅通的难点及其化解[J]. 农村经济, (10): 18-26.
- CHEN J. 2022.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for smooth urban-rural economic circulation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J]. *Rural Economy*, (10): 18-26. (in Chinese)
- 戴一鑫, 李杏. 2023-01-18(03). 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共享与动态平衡[N]. 中国社会科学报.
- 董济杰. 2017.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及对当前中国城乡一体化的启示[J]. 前沿, (8): 11-17.
- DONG J J. 2017. Marx and Engel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urrent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J]. *Forward Position*, (8): 11-17. (in Chinese)
- 范斐. 2024.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现实障碍与应对策略[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4): 72-78.
- FAN F. 2024. Obstacle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for facilitating smooth

- rural-urban economic circulation[J]. *Frontiers*, (4): 72-78. (in Chinese)
- 范根平, 王玲玲. 2023. 城乡融合的科学内涵及其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1): 146-152.
- FANG P, WANG L L. 2023.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J]. *Journal of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2(1): 146-152. (in Chinese)
- 冯淑怡, 鲁力翡, 王博. 2021. 城乡经济循环下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4): 4-12.
- FENG S Y, LU L F, WANG B. 2021. Rural homestead system reform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economic circulation[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4): 4-12. (in Chinese)
- 冯永泰. 2023.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依据、问题与路向——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视角[J]. 当代经济研究, (8): 23-31.
- FENG Y T. 2023. The basis, problems and direction of integr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ory of Marx and Engels[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8): 23-31. (in Chinese)
- 冯颖. 2021. “双循环”格局下的城乡要素流通市场机制构建[J]. 商业经济研究, (6): 24-27.
- FU Y. 2021.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circulation market mechanism under the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J]. *Journal of Commercial Economics*, (6): 24-27. (in Chinese)
- 郭殿生, 宋雨楠. 2019.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的新时代解读[J]. 当代经济研究, (2): 16-22.
- GUO D S, SONG Y N. 2019. Interpretation of Marx and Engel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ought in the new era[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2): 16-22. (in Chinese)
- 何兵兵. 2023-11-28(08).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N]. 中国纪检监察报.
- 贺培科. 2024. 城乡经济循环发展的运行机理、制约因素和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 (10): 135-144.
- HE P K. 2024.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circulation development[J]. *Rural Economy*, (10): 135-144. (in Chinese)
- 蒋永穆, 周宇晗. 2018. 改革开放 40 年城乡一体化发展：历史变迁与逻辑主线[J].

-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5): 1-10.
- JIANG Y M, ZHOU Y H. 2018.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trospect and summary[J]. *Journal of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5): 1-10. (in Chinese)
- 李怀. 2015. 马克思主义的城乡关系观[J]. 甘肃社会科学, (5): 105-109.
- LI H. 2015. On Marxism opinion about city[J]. *Gansu Social Sciences*, (5): 105-109. (in Chinese)
- 李俊高. 2023.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现实阻梗与实现路径: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J]. 学术探索, (12): 115-123.
- LI J G. 2023. The key links, realistic obstacle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unblocking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J]. *Academic Exploration*, (12): 115-123. (in Chinese)
- 刘易斯·芒福德. 2018.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与前景[M]. 宋俊岭, 宋一然,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original language) MUMFORD L. [1968].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M]. London: Mariner Books.
- 曾恒源, 高强. 2025. 以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重点、挑战与建议[J]. 农村经济, (2): 39-46.
- ZENG H Y, GAO Q. 2025. Deepening rural reform to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Key points, challenges, and suggestions[J]. *Rural Economy*, (2): 39-46. (in Chinese)
- 马德隆, 许正中. 2023. 马克思分工理论与数字时代产业融合[J]. 经济学家, (1): 5-14.
- MA D L, XU Z Z. 2023. Marx's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J]. *Economist*, (1): 5-14. (in Chinese)
- 马健. 2002. 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评述[J]. 经济学动态, (5): 78-81.
- MA J. 2002. Review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heory research[J]. *Economic Perspectives*, (5): 78-81. (in Chinese)
- 马克思, 恩格斯. 19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0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3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宁志中, 张琦. 2020.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J]. 地理研究, 39(10): 2201-2213.
- NING Z Z, ZHANG Q. 2020. Urban and rural element mobility and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priority development [J]. *Geographical Research*, 39(10): 2201-2213. (in Chinese)
- 苏毅清, 游玉婷, 王志刚. 2016.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理论探讨、现状分析与对策建议[J]. 中国软科学, (8): 17-28.
- SU Y Q, YOU Y T, WANG Z G. 2016.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eoretical discussion, situation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J]. *China Soft Science*, (8): 17-28. (in Chinese)
- 涂圣伟. 2021. “十四五”时期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 改革, (10): 22-30.
- TU S W. 2021. The dynamic mechanism and strategic path of smooth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J]. *Reform*, (10): 22-30. (in Chinese)
- 王海霞, 黄潇, 张帅. 2023. 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选择[J]. 中国行政管理, (7): 155-158.
- WANG H X, HUANG X, ZHANG S. 2023. Path choice of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integrated urban-rural development[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 155-158. (in Chinese)
- 王蕴. 2023-08-04(11). 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驱动力[N]. 经济日报.
- 王喆. 2024-08-27(10). 打通城乡要素流动梗阻[N]. 经济日报.
- 吴振方, 李萍. 2021. 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生成逻辑、现实梗阻与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 (10): 18-26.
- WU Z F, LI P. 2021. Smooth flowing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cycle: Logic generation, realistic ob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J]. *Rural Economy*, (10): 18-26. (in Chinese)
- 向国成, 湛亭颖, 钟世虎, 等. 2017. 分工、均势经济与共同富裕[J]. 世界经济文汇, (5): 40-54.
- XIANG G C, CHEN T Y, ZHONG S H, et al. 2017. Research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economy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universal opulence[J]. *World*

Economic Papers, (5): 40-54. (in Chinese)

向国成, 刘晶晶, 罗曼怡. 20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与市场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经济学动态, (9): 61-76.

XIANG G C, LIU J J, LUO M Y. 2021. Marx and Engels' division of labor and market though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value[J].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61-76. (in Chinese)

许彩玲, 李建建. 2019. 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思考[J]. 经济学家, (1): 96-103.

XU C L, LI J J. 2019.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Thought based on the Marxist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J]. *Economist*, (1): 96-103. (in Chinese)

亚当·斯密. 2014. 国富论[M]. 富强, 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original language) SMITH A. [17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M]. London: Printed for W. Strahan; and T. Cadell, in the Strand.

杨水根, 马悠弼, 李倩莹. 2025. 流通数字化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内在要求、理论逻辑与推进路径[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 21-29.

YANG S G, MA Y B, LI Q Y. 2025. Circulation digitization unblocks the mobility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Internal requirements,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omotion paths[J]. *Journal of Guiya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 21-29. (in Chinese)

杨永华. 2008. 卓炯与舒尔茨、杨小凯: 斯密定理研究比较[J]. 学术研究, (1): 44-49.

YANG Y H. 200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r. Smith's theorem, constructed with those Zhuo Jiong, Schultze, and Yang Xiaokai[J]. *Academic Research*, (1): 44-49. (in Chinese)

袁树卓, 刘沐洋, 彭徽. 2019. 乡村产业振兴及其对产业扶贫的发展启示[J]. 当代经济管理, 41(1): 30-35.

YUAN S Z, LIU M Y, PENG H. 2019. The 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y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41(1): 30-35. (in Chinese)

曾福生, 蔡保忠. 2018. 以产业兴旺促湖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J]. 农业现代化研究, 39(2): 179-184.

ZENG F S, CAI B Z. 2018. Realizing the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of Hunan by promoting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39(2): 179-184. (in Chinese)

张桂文, 王子凤. 2022. 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及实践经验[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3(6): 86-103.

ZHANG G W, WANG Z F. 2022.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3(6): 86-103. (in Chinese)

张世贵, 许玉久, 秦国伟. 2023. 农业农村数字化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作用机理与政策建议[J]. 改革, (7): 116-125.

ZHANG S G, XU Y J, QIN G W. 2023. Digit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to smooth urban-rural economic circula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s[J]. *Reform*, (7): 116-125. (in Chinese)

张衔, 范静媛. 2022. 比较优势还是绝对优势[J]. 当代经济研究, (9): 5-21.

ZHANG X, FAN J Y. 2022.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absolute advantage[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9): 5-21. (in Chinese)

赵霞, 韩一军, 姜楠. 2017. 农村三产融合：内涵界定、现实意义及驱动因素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38(4): 49-57, 111.

ZHAO X, HAN Y J, JIANG N. 2017. Integration of three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Connotation definition, realistic meanings and driving factors analysis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38(4): 49-57, 111. (in Chinese)

周清香, 何爱平. 2022.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及其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视角[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35(2): 29-38.

ZHOU Q X, HE A P. 2022.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urban rural integr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urban rural relationship theory[J]. *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35(2): 29-38. (in Chinese)

朱启臻. 2018. 关于乡村产业兴旺问题的探讨[J]. 行政管理改革, (8): 39-44.

ZHU Q Z. 2018. Exploration on the problem of rural industrial prosperity[J]. *Administration Reform*, (8): 39-44. (in Chinese)

The Real Obstacles,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Smoothing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YANG Shuigen MA Youbi LI Qian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Changsha, Hunan, China)

Abstract: Smoothing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is an objective requirement for enhancing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reliability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at there are real obstacles to the unimpeded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in China, such as the ineffective two-way flow of urban-rural factors, the low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urban-rural industries, and the insufficient coordination of urban-rural demand and supply, this paper,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relations, construct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smooth the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Further, relying on the theory of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ment, it deeply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for the unimpeded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through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ment. Finally,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smooth of the economic circu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needs to meet three dimen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icroeconomics, guiding the two-way flow of factors and constructing a unified market for urban and rural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so-economic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regions and promoting the accelerated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conomics, promoting the synergy of “efficient market” and “well-functioning government” to form a benign system of matching supply and demand.

Keywords: urban-rural economic cycle; political economics; division of labor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